

康有爲與萬木草堂學風

林 斌

(一)

自十九世紀以來，廣東以地緣關係，滙合了中原（黃河流域）文化、長江文化而孕育出其奮發踔厲的珠江文化。這一新興的珠江文化最具體而有力的表現，則莫過於清光緒十七年庚寅（公元一八九一）間，南海康有爲氏在廣州長興里，創立萬木草堂，招收天下有志之士，聚集一堂，講新學、倡變法。從學者有梁啟超、歐榘甲、韓文舉、徐勤、葉覺勵等，皆後來維新健將。在這六十年間，中國文化思想，直接間接與康氏在「草堂」時代所倡導的求仁主義學風有關。其流風遺韻，如波瀾壯闊，無可涯涘。

康氏原名祖詒，字廣廈，號長素，南海人，時稱康南海，又以有志聖人，故有康聖人之稱，生於清咸豐八年（一八五八）卒於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，年六十九。

萬木草堂創立時，正當鴉片戰爭後之五十年（道光二十一年），這五十年間，在中國歷史上言，真是遭逢亘古未有之奇變，中又疊經英法聯

軍入侵，而有北京和約，而增闢口岸。太平軍反

清之役，歷時十六年，糜爛十九省，死亡二十萬，殘破六百城。及甲午中日之戰，海軍幾盡，遼東幾亡，韓國獨立，臺灣割讓，償金二億，開埠四處，內江自由通航，內地從事製造，皆爲從前軍事所未有，交涉所未有，所謂內憂外患，紛至沓來，國將不國，人民亦失安身立命之所。清之朝野上下，始覺感受非常之痛苦，而病舊制之不適合矣。未幾，而英、俄、德、法諸國踵起，強迫立約，割我土地，定彼範圍。（見劉彥中國近時外交史：光緒二十四年，列國對中國形勢一變，英結楊子江不割讓與他國之約，德結租借膠州灣之約，俄租旅順大連，日本約福建不割讓與他國，法亦租借廣州灣。）於是一班深受儒家求仁取義思想薰陶之知識份子，處當時那種危疑震撼社會環境之下，自然難安緘默，南海康有爲氏固爲此中之表表者。有爲初從九江朱次琦先生學，日治宋儒之書及經史、小學、詞章，然以爲未足，乃辭歸，轉而攻陸王心學，並及西學，公

羊，以至亭林顧炎武經濟之學，卓然成家。

原來那時科舉未廢，八股文猶盛行，士子仍視之爲正學。羊城除學海堂、菊坡精舍、粵華書院、粵秀書院、廣雅書院五大書院外，尚有老師宿儒設館授徒，專課八股制藝，時稱「大館」。著名者有梁輯嘏、凌孟徵、石星巢等老師。這種「大館」冬至前後即放年假，士子乃利用此段時間另請別人講授八股制藝以外之功課，以求廣智，名之爲「冬館」。康有爲即曾任石星巢冬館的老師。康氏雖以一介布衣，然而學問淵博，才氣磅礴，上下古今，無所不談。平日不特爲士林所傾服，且因數上書德宗，力請變法維新，早已名動公卿，震驚時流。茲錄其上皇帝第一第三第四書與請開制度局疏，以見一斑。

（第一書）「所欲言者：曰變成法，通下情，慎左右而已。」

（第三書）「乞及時變法，富國養民，教士治兵，求人材而慎左右，通下情而圖自強。富國之法有六：曰鈔法、曰鐵路、曰機器、曰輪舟、曰開礦、曰鑄銀、曰郵政。養

民之法：一曰務農，二曰勤工，三曰惠商，四曰恤窮。教有及於士，有逮於民，有明其理，有廣其智。治兵之法：一曰汰冗員而合營勇，二曰起民兵而立團練，三曰練旗兵而振滿蒙，四曰募新製以精器械，五曰廣學堂而練將才，六曰厚海軍以威海外。凡此富國養民教士練兵之策，所以審端致力者，則在於求人才而擢不次，慎左右而廣其選，通下情而合其力而已。」

(第四書)「今當以開創治天下，不當以守成治天下，當以列國並爭治天下，不當以一統無爲治天下。」

(請開制度局疏)「立制度局以總其綱，十二局以分其事。一曰法律局，二曰度支局，三曰學校局，四曰農局，五曰工局，六曰商局，七曰鐵路局，八曰郵政局，九曰礦務局，十曰游會局，十一曰陸軍局，十二曰海軍局。」

後「學海堂」高材生番禺陳千秋(禮吉)，新會梁啟超(卓如)輩，聞康氏上書不達，自京歸粵，即雀躍相告，偕往問業。此事，據梁任公在其三十自述有云：「通甫(禮吉字)相語曰：『吾聞南海康先生，上書請變法不達，新自京師歸，吾往謁焉。其學爲吾與子所未夢及，吾與子今得師矣。』於是，乃因通甫修弟子禮，事南海先生。」任公又在其清代學術概論中云：「啟超年十三，與其友陳千秋同學於學海堂，治戴段王之學，千秋所以輔之者良厚。越三年，而康有爲以布衣上書被放歸，舉國目爲怪，千秋啓超好

奇，相將謁之，一見大服，遂執業爲弟子，共開館講學，即所謂萬木草堂也。」又康有爲自編年譜，於三十三歲(己丑)時亦云：「三月，千秋來見，六月來及門。八月，梁啟超來學。」年譜並自述其開堂講學之經過云：「光緒十七年始開堂於長興里講學，大發求仁之義，而講中外之故，救中國之法。來學者多志士，若韓文舉、梁朝杰、曹泰……既明而起，講貫至深夜。……新學僞經考刻成，陳千秋、梁啟超助焉。……十八年，移講堂於粵城衛邊街鄭氏祠。十九年，遷草堂於府學宮仰高祠，以梁啟超(卓如)、陳禮吉充學長焉。」

從上看康梁師弟記述，萬木之創立，實醞釀於光緒十六年(己丑)康氏自京放歸後。翌年(庚寅)乃草創於長興里。十九年(壬辰)大盛，來學者日衆，因遷入府學宮仰高祠，始正名爲萬木草堂。而陳千秋、梁啟超二人爲草堂最早之學生。大抵有爲當日書不達，鐵羽南歸，倥傯抑鬱，無以復加；深嘆其道之不行，大有夫子自衛返魯的心情，思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以傳其道而廣聲氣，此亦懷道君子不得已之苦衷。厥後更得陳禮吉、梁啟超二人來學之鼓舞，因此，康氏之開館講學，良有以也。

(二)

康氏爲儒家學者，開堂訓士，其學綱與學科，當然以孔子之四教：「文行忠信」爲鵠的。且又嘗從九江朱次琦先生遊，次琦先生立「四行五學」之教，所謂四行，曰：「敦行孝弟，崇尚名節，變化氣質，檢攝威儀」；五學則爲「經學、

史學、小學、掌故、詞章。」所以康氏撰長興學記之學綱與學科，除了小部份爲適合時代潮流，接受泰西學術思想之研習者外，餘則多仍其師門之遺意。梁任公之長興學記表，曾分列其爲三項如下：

甲、學 綱

- (一)志於道：格物、克己、勵節、慎獨。
- (二)據於德：主靜出倪、養心不動、變化氣質、檢攝威儀。
- (三)依於仁：敦行孝弟、崇尚名節、廣宣教令、同體飢溺。
- (四)游於藝：禮、樂、書、數、圖、槍。

乙、學 科

- (一)義理之學：孔學、佛學、周秦諸子學、宋明理學、泰西哲學。
- (二)考據之學：中國經學史學、萬國史學、地理學、數學、格致學。
- (三)經世之學：政治原理學、中國政治沿革得失、萬國政治得失、政治實用學、羣學。
- (四)文字之學：中國詞章、外國語言文字學。

丙、科外學科

- (一)校中：演說(每月朔望課之) 節記(每日課之)

- (二)校外：體操(每間一日課之) 游歷(每年假日課之)

右所記萬木草堂之學綱與學科，體備大用，幾可與今日大學課程相埒。然而單憑這點，在教育效果而言，還是不够的。因爲一切學制學科，

都是教育事業之軀殼，倘沒有奮發向上的學風與平剛健渾雄的精神爲其靈魂，則必奄奄無生氣，自難望收養士之功。只惜數十年來我國言教育者，惟知汲汲於學制之改革，學科之新訂，而恒忽略學風之培養，人云亦云，今日倡「道爾頓制」，明日又侈談「動的教育」，結果一無是處，卒使邪說紛乘，釀成眼前禍亂相尋之局！抑尤有可哀者，國家文化因之日趨衰落，人才日漸凋零而無爲繼，學者徒成一技之長，競爲如梓匠輪輿之求食，或只爲自己之富貴利祿而營心，對國家社會事，則曰「干卿底事」，避之惟恐不及！父兄以此諭其子弟，師長以此詔其學生，迨一旦禍變遽來固乏肆應長才，更無殉國烈士，欲國不亡，種不滅，寧有是理？！

我國儒家的精神就恰與此相反。他們講仁與義，一開頭即以天下爲己任，故曾子曰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，仁爲己任。」流風所及，范希文（仲淹）乃有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偉大襟懷，以垂範後世。所以，良好學風之培養，當爲教育之第一要義，已屬無可置疑。正如莊子所謂「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」此理至爲顯然。萬木草堂師弟們，既上承儒家思想精神之培育，則其學風與精神，自與今日西方式教育之只重個人發展者，迥然不同。

(三)

至於康氏講學情形，已如其自編年譜所云：「與諸子日夕講業，大發求仁之義，講中外之故，救中國之法。」而梁任公撰南海先生七十壽

言，對當日講習情形，更有生動感人之描述，任公云：

「吾儕初待先生於長興里也，徒侶不滿二十人，齒率在十五六乃在十八九之間，其弱冠以上者，裁二三人耳。皆天真爛漫而志氣踴躍向上，相愛若昆弟，而先生視之猶子。堂中有書藏，先生自出其累代藏書置焉。……嚮晦則燕見，率三四人入室旅調，亦時有獨造者，先生始則答問，繼則廣譚，因甲起乙，往往遂及於道術，至廣大精微處，吾儕始學耳，能質疑難者蓋眇其有之，則先生大樂，譚益縱，而所以誨之者益豐。每月夜，吾儕則從遊焉。粵秀山之麓，吾儕舞雩也，與先生相期焉，或不相期焉。而春秋佳日，三五之夕，學海堂，菊坡精舍，紅棉草堂，鎮海樓一帶，其無萬木草堂師弟踪跡者蓋寡。每遊率以論文始，既而雜遝於宇宙萬有，茫乎沕乎，不知其所終極。」

由此可見他們師弟爲學之心，已至好之樂之的程度。無怪這班人在近代中國政治文化史上多有良好表現和成就。

在康氏講學時代，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提起的，就是他們師弟間在學問上的啓發與研討，絕不似其他讀書士子之虛應苟且，而學生對師長也甚少抱有偶像之心，而肯終日不違如愚。往往詰難大半天，卒至各得其所，問者心誠悅服而後已，有爲自編年譜記陳禮吉之初謁，謂「以客禮來見，凡三與論詩禮，泛及諸經。」梁任公在三十自述中，寫其拜師經過，亦寫得淋漓盡致，如

聞其聲，如見其人，文云：

「因通甫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。時余以少年科第，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，頗有所知，輒沾沾自喜。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，取其所扶持數百年無用舊學，更端駁詰，悉舉而摧陷廓清之。自辰入見，至戌始退。冷水澆背，當頓一棒，一旦盡失其故壘，惘惘然不知所從事。且驚且喜，且怨且艾，且疑且懼，與通甫聯牀，竟夕不能寐。明日再謁南海，請爲學方針，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，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。自是決然捨去舊學，自退出學海堂，而間日講業於南海之門。」

可見當日康有爲確有一套令人欽折的學問，自非純盜虛聲之士可比，而以至誠感人，尤令那一班有抱負之青年景然風從，甚而有人爲之慷慨赴義，或終其身死守善道者。此即昔賢所謂「唯天下至誠爲能化」甯有我欺？

廣州府學宮，原有好幾位老師宿儒在那裡設館的，通常非有舉人進士之資格是不得在此開堂講學。可是那時康有爲假仰高祠立萬木草堂，他還未中式舉人，只是一名廩生，可稱一布衣身，自然這種破例之舉，未免大遭廣府一班士紳非議。但以他的盛名高才，非議者亦無可如何。且他當日生徒中固不乏舉人秀才之輩，故康氏亦常以此解嘲。

(四)

正式列名萬木草堂的學生，據說只不過四五十人左右，齒最尊者爲崖州舉人林續統，五十多

歲，其次爲王鏡如，年長於康，最稱爲梁朝杰，當時不過舞勺之年。康升座講學時，特具風趣者，乃係先使人搗鼓爲號，四鄰學子聞聲畢至，往往逾一二百人，座爲之滿。康大樂，論益縱，旁若無人。因此，當時詆之者斥爲怪，譽之者曰「康聖人」。但康雖縱論如此，然其儀表端莊，從無文人不修邊幅的陋習。盛暑見客，亦必肅整衣冠而出。他講學，御長袍小褂，學生亦人人穿矮領藍布長衫（大衣）入座。當時所着矮領藍長衫，亦爲萬木草堂師生一特色。草堂學費之徵收，亦從無規定額，大抵每人送修金十兩至二十兩不等，此與他館亦有異。

時簡朝亮（竹居）亦在廣州城設館，簡康二人俱出朱九江門下。惟二人爲學各有所立，簡主靜守常；康主動求變。守常則崇古，求變則務新。因此，兩家弟子亦各持門戶之見，每相逢多辯難不已。然亦足覘當日學風之純良，絕不似時下學生浮泛膚淺，嘩啦終日，而不及義也。

戊戌政變後，萬木草堂隨之被查封停辦。然康氏風教之被，固有人間關萬里，棄家相從，雖顛沛而不移者；亦有人懷抱利器，欲五步流血以殉道死義耳。其感人之深有如此。烈哉！

(五)

萬木草堂以後，一脈相承之發展，如：梁啟超在湖南辦時務學堂；徐勤等之在日本橫濱辦大同學校；韓樹園之在粵辦南強公學及其晚年於廣州城西設覺是草堂講學。都無不因康門此一遺風與精神而施教，以故濟濟多士，人才輩出。

時務學堂正式成立於光緒二十三年八月，熊希齡爲總理、王先謙、張祖同、黃自元爲學董、梁啟超充總教習，並偕其同門韓文舉、歐策甲、葉覺頓等同往當分教習。時務學堂，設在長沙城衡陽會館，另在長沙北門外侯家壩，購地數百畝，籌建新舍，學額暫定一百二十名。所立之學約十條，則其能培養出剛健如蔡鐸（松坡）、篤志如范源廉等豪傑之士，當非偶然倖致。其學約十條如下：

一曰立志：立志如下種子（朱熹語）、須先有知識然後有志（陸象山語）。志既定之後，必求學問以敷之。當師孟子、范仲淹、顧亭林。

二曰養心：孟子一生得力在不動心，故能成大丈夫，反此則爲妾婦之道。曾文正百折不回，故能以大儒定大亂。養心爲治事之原，須先破苦樂，次破死生，再次破毀譽，始不至心灰意冷，身敗名裂。養心之法，不外靜坐與閱歷。學生無閱歷，不妨虛構一艱苦之閱歷。學生日日思之，以期訓練成熟。

三曰治身：當於每日就寢之時，默思一日之言行。失檢者幾何，而自記之。始而覺其少，苦其不自知也，既而覺其多。然不可自欺，又不可自餒，一月以後，自日少矣。

四曰讀書：非讀萬國之書，則不能讀一國之書。然必須數年之力，使學者於經史大義，悉已通徹。根柢既植，然後以其餘日，肆力於西籍。顧載籍浩繁，精要不及什一，又必有上下古今，縱橫中外之學者，始能提要鉤元。苟學識不及，雖三復若無睹。今分經史子西籍四科，間日爲

課，凡學者每人設筆記一冊、分專精、涉獵二門，每日必就所讀之書，發新義數則。其有疑義，則書而納之「待問廬」而待條答。

五曰窮理：今格致之書，略有譯本。功課舉後，由教習隨出數道問題，使精思以對，然後教習乃將所以然之理示之。

六曰學文：每日課卷一次，當以詞達爲主，力求條理細備，詞筆銳達，不必求工。苟學無心得，而欲以文傳，亦足羞也。

七曰樂羣：每月以數日爲同學會講期。並各出筆記，互相問難。

八曰攝生：七日來復，中西同俗。起居飲食，皆有定時，以上八條，每日功課所當有事。以下二條、學成以後所當有事。

九曰經世：經世必深六經周秦諸子爲經，以求治天下之理。必博觀掌故治革與泰西古史爲緯，以求治天下之法。

十曰傳教：孔子之教，非徒治一國，乃以治天下。當共矢宏願，以傳孔子太平大同之教於天下。

他們這一班萬木草堂出身的青年學者，不但學問又新又好，而且朝氣勃勃，做起事來勇猛精進，自然博得學生們的羣相擁戴，也頗使湘省學風爲之丕變。雖然他們留在時務學堂爲時甚暫（據說不够半年，因招當道之大忌，斥梁等爲會匪，於是不得不離湘而歸），但他們給予三湘人士之影響，亦深亦遠。有人說梁任公此次之來湘，「不僅爲時務學堂總教習，且爲湖南全省總教習」，言非無因。